

中西對話
汪琪 主編

當代 西方思想的困局

勞思光 著



中西對話
汪琪 主編

當代 西方思想的困局

勞思光 著



中西對話

當代西方思想的困局

作者：勞思光
叢書主編：汪琪
發行人：王春申
副總編輯：沈昭明
編輯部經理：葉欄英
責任編輯：王窈姿
封面設計：吳郁婷
校對：張麗莉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0046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傳真：(02)2371-0274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E-mail：ecptw@cptw.com.tw
網路書店網址：www.cptw.com.tw
網路書店臉書：facebook.com.tw/ecptwdoing
臉書：facebook.com.tw/ecptw
部落格：blog.yam.com/ecp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4年11月
定價：新台幣 380 元



ISBN 978-957-05-2969-2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西對話叢書序

清末民初的百年間西學東漸，中國的思想與學術在一場驚天動地的典範轉變後，逐漸陷入一個歷史學家余英時所謂的「雙重邊緣化」困境。在理論知識上忠實追隨西方，不僅使我們在國際學術版圖上淪為邊緣，研究對本土社會文化發展的貢獻也頗為有限。華人社會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上年復一年投入龐大人力與資源，但我們是否真正瞭解「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意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看待西方、重建「主體性」，又如何學術上與西方對話？

許多人急於提出「本土理論」，然而理論知識的產生必須由更根本處著手。無論是對西方論述的回應、由現代學術的觀點詮釋傳統、檢視中西思想交流，或直接面對本土學術議題，系列叢書的目的都在以一種較「本土化」視野更為寬廣的思維，來推展本土學術可長可久的發展。

一、前言：勞思光教授的學術志業與學思歷程

勞思光先生一生以《中國哲學史》聞名於世，他是少有的屬於哲學專長領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實際上勞先生的文化志業與學術成就遠遠地超過《中國哲學史》的局限。林正弘教授推崇勞思光先生是一位「對中國古籍如數家珍，而又精通西方哲學的哲人。……（勞先生）在西方傳統哲學與當代歐陸哲學方面有深厚的造詣，而對英美哲學的最新發展也充分享握，且有獨到的見解。」¹關子尹教授指出勞先生在治學之餘，積極宣揚自由主義精神，投身於兩岸政治社會文化的批判工作。他推崇勞先生不只具有學者的風範，更心懷國士的胸襟，堪稱公共知識份子的典範。²劉國英教授尊稱勞先生是「當代中國批判思想

1 參閱林正弘，〈沒有勞先生的台灣哲學界〉，收入王隆升編「勞思光教授紀念特輯」，《國文天地》月刊，第28卷第8期，二〇一三年一月，頁22。

2 參閱關子尹，〈豈只學者風範，更乃國是胸襟——痛悼勞思光教授〉，收入王隆升編「勞思光教授紀念特輯」，《國文天地》月刊，第28卷第8期，二〇一三年一月，頁18—19。

家和世界意義的哲學家」。他強調勞先生不是以弘揚國學的民族主義心態來撰寫《中國哲學史》，而是「從理論效力的高度，來分析、判別與評估中國思想家在哲學理論上的成就與貢獻」。再者，勞先生在《歷史的懲罰》中，以一種動態的歷史觀進行對中國文化的考察，也就是用一種開放性思維的態度而不是獨斷論形上學的封閉方式來看待中國文化。最後，勞先生秉持康德批判哲學的精神，力主中國哲學通往世界哲學開展，努力發掘傳統中國哲學中具有普遍價值的成素，使之成為能面對當前世界文化問題的思想資源，讓中國哲學成爲一種能繼續發揮功能的哲學。³沈清松教授指出勞先生晚年之所以契合於哈伯瑪斯的文化哲學，是因為勞先生高度肯定哈伯瑪斯構思了一個足以促進人類理性健全發展的完善計畫，並把第二次的啟蒙運動擴大到能夠涵蓋人類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s）的生活世界。勞先生珍視哈伯瑪斯哲學堅持人類理性以對抗後現代的反理性主義的勇氣，可稱之爲「理性的希望」（hope of reason），並且透過理性的兩個功能：「批判」（the critical）和「建構」（the constructive），繼續從東西方文化傳統之間的互相豐富中獲益，讓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一起合作，以共同面對後現代主義的挑戰。沈清松教授推崇這是勞先生「面對中國與世界文化危機的宏偉視野」。⁴

勞思光先生本名榮璋，號韋齋，思光是先生的筆名。先生本籍湖南長沙，一九二七年出生於陝西西安，一九四六年就讀北京大學哲學系，一九五二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哲學系。一九五五年因辦報論政，不容於戒嚴政府而離台赴港，先後任教於珠海書院與

香港中文大學。兩度赴美為訪問學人（哈佛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1969—1970）、普林斯頓大學（1975—1976））。一九八五年從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後轉任原校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逸夫書院高級導師（1986—1997）。一九八九年台灣解嚴，勞先生返台任教於清華、師大、政大與東吳等校客席。一九九四年起受聘於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與哲學系講座教授，直至二〇一二年十月辭世為止。勞先生的學術成就頗受學者肯定，一九九六年起獲聘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二〇〇一年獲行政院文化獎，二〇〇一年獲教育部學術獎，且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並多次主持國家講座（2002—2009）。

勞思光先生出身翰林世家：高祖父崇光公官拜兩廣總督、雲貴總督；祖父啟恂公曾任陝西鄜州知府；父親競九先生，中將軍階退伍，曾加入同盟會與參與辛亥革命。勞先生幼

3 參閱劉國英，〈當代中國的批判思想家和世界意義的哲學家〉，收入王隆升編「勞思光教授紀念特輯」，《國文天地》月刊，第28卷第8期，二〇一三年一月，頁36—39。

4 參閱沈清松（Vincent Shen）教授，在第18屆國際中國哲學會（紐約大學水牛城校園，2013.07.21—24）所發表的英文論文〈在勞思光與唐力權哲學中的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 in Lao Sze-Kwang and Tong Lik-Kuen's Philosophies）。

承家學，加以天資聰穎，七歲即擅詩能文，從此奠定了深厚的國學基礎。⁵勞先生生長在中國傳統文化開始失效，而現代文化建設尚未就緒的迷亂時代，不得不詢問「中國的路向為何？」「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等問題。勞先生從二十歲之前（約當勞先生入學北京大學哲學系前後）即開始關心當代中國與世界的文化危機與哲學危機問題。為文化危機與哲學危機尋求解決困境的可能途徑，便成為勞先生一生爾後約六十五年學術歲月的研究旨趣所在。晚年勞先生的學術生活更聚焦於為建立一個足以解決當代文化與哲學困局的文化哲學奠定理論基礎而戮力不懈。

勞先生自己把他個人哲學思想的發展過程劃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⁶：

1. 早期：主要包括一九五八年以前所發表的著作，此時期的論著主要發表於《民主潮》，旁及《祖國周刊》、《民主評論》、《大學生活》、《自由學人》等雜誌，最後被集結為「思光少作集」七冊（1986—1987）⁷。此時期勞先生的思想的主軸主要採用「黑格爾模型」（Hegelian model）來探求中國儒學的新出路，並旁及對西方傳統與近現代哲學的融攝。

勞先生的早期思想，關心中國現實的政治情勢與歷史文化發展，探究中西哲學思想潮流，勤於著述立說並撰寫時文政論，並不局限於專業的哲學理論建構工作。勞先生憂心於西潮東漸下的苦難中國在喪權辱國與風雨飄搖中彷徨掙扎的現實處境與歷史困境，故有大量的政治社會文化評論發表，都被編輯在《少作集》的合集裡。

此時期的勞先生對於中國哲學的研究，不管是專書或論文，發表得比較少，反而對於西方哲學下了不小的工夫，舉凡康德、黑格爾、科靈烏、拉斯基、密爾、卡西勒、海葉克、齊克果、許懷惻、湯恩比、石里克、路易斯、阿德利希、魏思曼、懷德海……等等哲學家，都有所涉獵且有論文發表，並有後來《哲學問題源流論》（1956—1957）、《康德知識論要義》（1957）、《思想方法五講》（1958）、《存在主義哲學》（1959）……等重要哲學專書的出版。

這時期的勞先生對於康德哲學與黑格爾文化哲學主要採取「主體性」的思想架構，用

5 勞先生一生除發表一系列的哲學文化學術著作與撰寫文化政治評論文章之外，亦擅長寫作古典詩詞以寄託感時家國之懷。華梵大學中文系邀集校外師長合組「韋齋詩會」讀書會，編纂成《勞思光韋齋詩存述解新編》一書，述解詩詞兩百五十餘首，由王隆升教授主編，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出版，二〇一二年。

6 參閱勞思光《文化哲學講演錄》「自序」（註），（二〇〇二年）。

7 「思光少作集」七冊：《儒學精神與世界文化路向》、《哲學與歷史》、《哲學與政治》、《知己與知彼》、《遠慮與近憂》、《西方思想淺談》、《書簡與雜記》，台北：時報文化，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

來作為詮釋儒學的心性之學與道德修養論，以及評論中西文化問題的理論模型。康德的主體性是「自由意志」；黑格爾的主體性是「絕對精神」，勞先生的主體性應該是比較接近於康德的儒家孟子心學的「良知」、「本心」等自覺意識。⁸勞先生在這裡採取黑格爾哲學的主要思想形式是由「主觀精神」（心）向「客觀精神」（物）開展的「外在化」（externalization）活動過程。這也就是「文化精神」客觀化落實為「文化現象」的活動過程。這個「主體性」與「外在化」的理論模型的形式使用，一直延續到勞先生中期思想期間，撰寫《中國哲學史》時，作為評判中國哲學史發展中各家各派哲學理論得失的主要判準。至於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概念、「辯證法」方法論與存有論體系，並不被勞先生所青睞。

2. 中期：作品約略包括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〇年代勞先生離台留港期間所發表的專書、論文。後經收錄、編校與重刊為「思光學術論著新編」十三冊（1998—2001）⁹，以及《中國哲學史》三卷四冊行世。此時期勞先生的思想主軸在於「中國傳統哲學的系統闡釋」與「西方現代及當代哲學思想的清理」。前者，最具體的成果便是《中國哲學史》在「世界哲學」的學術視野與「基源問題研究法」的哲學史方法論方面都成為中國哲學研究的新典範；後者，主要是勞先生漸漸走出黑格爾文化觀的局限，進而消化吸收西方現代哲學與當代哲學思想，從文化哲學到文化科學，從英美哲學到歐陸哲學的醞釀過程。這成為勞先生從早期向晚期思想轉變發展的過渡時期。

勞先生漸漸了解到黑格爾的「主體性」與「外在化」文化哲學的模型，如果只就一個文化的內部發展來看，則此一模型的理論效力即已足夠。但若是涉及多數的異質文化並立而交互影響的跨文化領域，則顯得不夠適用。特別像十九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危機問題，便都是由外來異質文化的壓迫所產生，此時若只使用黑格爾模型來討論問題，便顯得局限。因此，勞先生引進帕森斯模式（Parsonian Model）來補足黑格爾模式的不足。相反於黑格爾「由內而外」，文化科學家帕森斯的「功能結構主義」以外在經驗生活世界為原出，再「由外而內」內在化（internalization）為內在的價值意識世界。如此便結合成「雙重結構的文化觀」：一方面由自覺性或文化意識為根本，從此由文化精神衍生文化生活的「外化結

8 因此要理解勞先生的早期思想方法，《康德知識論要義》、《思想方法五講》是最重要的著作。

9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十二冊：《中國文化要義新編》、《存在主義哲學新編》、《思想方法五講新編》、《哲學淺說新編》、《歷史之懲罰新編》、《中國之路向新編》、《文化問題論集新編》、《大學中庸譯註新編》、《康德知識論要義新編》、《哲學問題源流錄》、《自由、民主與文化創生》、《思光人物論集》、《家國天下——思光時論文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構；一方面由「社會性的實有」(social reality)為根源，由經驗世界形成文化意識的內化結構。勞先生在這裡不局限於黑格爾理論模型而走出意識哲學局限的轉變，加上爾後對於康德批判知識論的堅持，與放棄大系統哲學的企圖，讓他漸漸地與當代新儒學的哲學思維漸行漸遠。

再者，勞先生一九六九年起赴美訪問，讓他在英美哲學的學識上大有長進。他對於英美分析哲學的當代意義理論本已有所把握，後來又親自接受蒯因教授(W. V. O. Quine, 1908—2000)的有力刺激，還有與維也納學派費格爾教授(H. Feigl, 1902—1988)的談論，使勞先生對於維也納學派卡那普(R. Carnap, 1891—1970)的物理主義的立論與用心所在更為明確的理解。勞先生在美國接觸哲學界人士既多，又覺察到二次大戰後西方哲學思想之演變有越來越複雜的傾向，終於認識到分析哲學雖然能提供嚴密思考的訓練，但卻逐步失去歐美哲學的主流地位。這也就影響到勞先生開始轉為注意歐洲德語哲學的發展情況。¹⁰

3. 晚期：自從一九八〇年代至今，已出版的專書或論集共有以下五種：《中國出路問題的新檢討》(1993)、《思辯錄——思光近作集》(1996)、《文化哲學講演錄》(2002)、《虛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2003)、《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2007)。此時期勞先生的思想主軸在於直接面對哲學與文化危機，全心致力於文化哲學的理論建構。其具體思想成果，依據張善穎先生〈勞思光哲學：一個綜覽〉一文之分析，可以區分為四個領域：①「中國文化路向的檢討」；②「中國哲學的特性及其

未來」；③「文化危機之克服」；④「哲學危機之超越」。11在此僅略敘思想內涵重要關鍵所在：

勞先生以前述「雙重結構的文化觀」取代原先所持守的黑格爾模型，重新檢討中國文化的路向問題。他並提出「結構與歷程」、「創生與模擬」兩對理論區分，分析辨別得出：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應該屬於一個跨文化之間動態的模擬歷程，並不是經由文化精神層面上觀念的改造來重現一個內在的文化創生過程。12勞先生進而以「批判意識」與「建設意識」兩種文化意識，來重新審視中國文化轉型的發展過程。最後，勞先生表現出對於當代知識份子片斷地受到後現代文化的觀念影響，反對理性、否定規範規則、否定現代文化、混淆了前現代與後現代，等等亂象非常憂心。他對於後現代文化的知識片斷化、理論的自我矛盾（一方面宣稱「反對理論建構」，一方面又有所理論宣稱）、陷入社會秩序的虛幻化、

10 參閱勞思光，《思辯錄——思光近作集》（台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六年），〈自序〉，頁2—3。

11 編入張善穎，《勞思光哲學要義——超越中國哲學史》（*Understanding Lao Sze-Kuang: Beyond the Crisis of Culture and Philosophy*）。（台北：EHG Books 微出版公司，二〇一三年），頁175—182。

12 參閱《中國文化路向問題之新檢討》，頁52—55。

價值的相對性等問題都提出批判。 13

勞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三卷四冊完成（1981）之後，在一系列的論述與講演中所提出的重要觀念，對於中國哲學未來的研究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啟發，例如：「在世界中的中國」（China in the world）之學術視野、「開放成素」（open elements）與「封閉成素」（close elements）的分辨、「引導性哲學」（orientative philosophy）與「認知性哲學」（cognitive philosophy）的區分等等。 14 再者，勞先生努力闡發了傳統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視域中所具有的普遍意義和價值之精彩所在，例如：儒學的德性工夫論在「主體性」（subjectivity）與「實踐」（Praxis）性質中可能的開展；以及道家哲學可向「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與「主體性之解消」開放的理論可能性……等等都讓中國哲學具有現代世界哲學的理論意義。至於西方哲學方面，歐洲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與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詮釋學，後期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語言哲學與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29—）的溝通行動理論等當代歐洲重要哲學理論都為勞先生所探索而融攝。特別是哈伯瑪斯哲學中的普遍語用學、交互主體性、對話倫理學、溝通理性、事實與規範的分判，以及後形上學思維（超脫實體性或主體性哲學的思維）的程序合理性成為勞先生晚期建構文化哲學理論最為重視的哲學思維。

對於以上勞先生的晚期思想，也就是完成《中國哲學史》之後，思想發展轉向的歷程，以及所開展論域的新格局，進行一番全盤性的輪廓描繪有其必要。勞先生晚期思想的

進展，特別是最後幾年為文化哲學理論奠基的探討用心所在，可以從解放意識與建設意識兩個方面來加以把握：首先，從解放意識這方面來看，本書較為完整地記錄了勞先生對於後現代哲學與文化的分析與批判，便是絕無僅有的也是最好的代表作。至於從建設意識方面來看，則勞先生晚年所對於哈伯瑪斯哲學持續的消化與吸收，雖然還未能親自寫作成書，我們仍能期待從豐富的上課講演記錄中去整理出勞先生的想法與洞見所在。

二、從「希望世紀」到當代世界的「三重困局」

勞思光先生約略在《中國哲學史》完成之後，接著便著手清理二十世紀的哲學問題，要審視現代文化之下哲學思維如何演變？以及達成什麼樣的成果或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13 參閱《遠景與虛境——論中國現代化問題與後現代思潮》，頁215—218。

14 勞先生認為中國儒釋道哲學之企求「成聖」、「成佛」，屬於「引導性哲學」，目標在尋求「自我轉化或社會轉化」，故可以在道德哲學（心性哲學）或政治社會哲學領域發揮中國哲學思維的「開放成素」而有所貢獻於「世界哲學」的建構。

這也就是「當代哲學」(contemporary philosophy)思想的清理。

勞先生看待當代世界文化與哲學的危機，是從十九世紀被稱作「希望的世紀」(century of hope)開始的。當時歐洲的知識份子有一個共同的信念，都認為世界與文化生活永遠在進步當中。然而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所暴露的種種問題越來越複雜，原先充滿希望的世界，漸漸走向處處是「困局」(predicament)的世界。勞先生稱之為當代世界的「三重困局」(triple predicament)，這是本書第一章主要的內容：

1. 第一重困局是指傳統與現代性的緊張關係。現代性是歷史上少見的巨大變化。韋伯「解除魔咒」(disenchantment)的說法，指出現代化的社會徹底被改變，結果跟傳統的一切規範、思考方式與行為方式都不同了。傳統亞里斯多德「目的論」的世界觀漸漸改變成物理科學「機械論」的世界觀。因此傳統與現代文化之間產生了很多不相容而造成種種衝突張力的成分。

2. 第二重困局是指現代文化本身有它的不完整性，故有所謂現代文化的「病理學」(pathology)。現代文化講求理性，但最後卻陷溺於一味追求「工具理性」。「價值理性」或「目的理性」的喪失，使得現代文化暴露出種種窘境。十九世紀三位批判現代社會的質疑大師：從宗教的角度來看，認為現代宗教墮落，這是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想法，是從最窄的範圍來批判、質疑現代文化。從經濟結構來看現代社會中的種種剝削與不公平現象，是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思想的重點。但是從根

本上懷疑理性思維傳統的思想家，代表人物就是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勞先生對於現代社會進行病理學的剖析提出三個問題：①「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工業科技與資本累積伴隨著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擴張。②「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只問技術、手段、策略，不問價值、道德、目的。③「物化」（reification）：把人當成一個可以交換的貨物。

3. 第三重困境是指「對於理性的不信任」，因此可稱為反理性思潮。由於對於現代文化的不信任而出現反現代文化的思潮，因此而有「哲學的終結」一類的說法。

反理性思維對於理論語言與行為規範的約定，必然造成種種病態而可能引發文化危機：

a. 片段化（fragmentation）的病態：後現代論述的理論總是依據小範圍、片段化的結論去作普遍、全體的判斷。但即便片段裡的論證是可以成立的，為什麼可以據以為普遍化的判斷？例如傅科對於權力、社會的觀點，他對於瘋人院的研究，他很輕易就把局部的研究擴大，變成為社會權力迫害、壓制過程的普遍理論。

b. 特權化（privilege）的病態：他一方面說人類理性思維是不可相信的，但是卻又相信自己的論述是真理。這樣的發言實際上就成了一種特權。

c. 虛無化的病態：由於不相信理性，因此指向行為的根據何在，所使用的規範語言也就沒有客觀地判準，使得社會規範沒有共同的基礎，一切社會價值虛無化，產生真正的文